

中 国 经 验

林村 的故事

黄树民著

素兰 纳日碧力戈译

一九四九年后的
中国农村变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 黄树民著；
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3
（中国经验）

ISBN 7-108-01684-2

. 林... . 黄... 素... 纳... . 村史-
研究-厦门市-1949~ . 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2043号

责任编辑 杜 非
封扉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厂印刷
版 次 2002年3月北京第1版
200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字 数 212千字 图字01-2001-4617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18.00元

一 版 序

葛伯纳 (Bernard Gallin)

我之所以会参与本书并为之作序，除了学术上的因素之外，还有个人的渊源。1969年，我在台湾与黄教授初识。当时我正在进行关于中国文化及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黄教授此时刚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我很高兴他愿意与我共事，做我的研究助理。那次的田野调查圆满成功，黄教授功不可没。从那时候开始，多年来我们一直联系不辍，起初像师生一般，黄教授在1970年到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我们便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上互相切磋。

1984年11月间，我到福建去拜访刚开始在当地做研究的黄教授，虽然我只作短暂停留，却对中国农村生活有更深切而重要的认识。黄教授向我介绍村子和村民的状况，并指出近来的经济改革对乡村的影响，以及它与台湾的社经发展、变化之间的关联。

长期以来，大多数的研究学者，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认为，台湾经验与中国大陆无关。两地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相差悬殊，根本无从比较。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倡导经济改革，并且“开放”之后，才有人认识到，经济重组所引起的改变，尤其是农村的改变，与台湾的发展过程相当类似。故一般认为，这样的比较，使得双方的范例都可作为诠释中国改变的起

步，同时也是了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

黄教授的研究正可作为这类比较的基础。在他早期针对台湾所作的深度研究（Huang 1981）中，记录了政府政策导致“农业衰退”（degradation of agriculture）并侵蚀社区共同体聚合的基石。他目前的研究，则突显了类似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国家政策的运作情形。他针对福建的农村所作的研究，敦促我们注意下列几项因素之间的关联：政府政策，农村的变化和长久存在中国研究中的几个课题——例如，政府介入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组织并加以控制的实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社会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黄教授对农民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对此社会阶层作适当的定义，并了解中国政策中的“转变”（twists and turns）。长期以来，农民到底是非资本主义的实质生产者，还是企业资本家（capitalist entrepreneur），一直是颇受争议的话题。由于这个问题与国家现代化紧密相连，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站在反方的立场。中国共产党深怕一旦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会导致“资本家复辟”（capitalist restoration）（Hinton 1972:9—22），所以采取了不同的，而且看似自相矛盾的角度，来看待广大的中国农民。

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年以来，用韩丁（Hinton）的话来说，其领导人认为农民是“充满中产阶级意识的小规模生产工具持有人”（1972:25），满心梦想要“扩大私人土地……扩充自由市场，将计划降到家庭层级，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1972:42）。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中产阶级意识”无异是中国进步的障碍，因此国家必须积极纠正农民“短视”、“倒退”和“迷信”的心态。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30年的历史，最引人注意的计划莫过于根除“（农民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和习惯……以及一切反映和保存此类陋习的机制”的计划。（Hinton 1972:19）

黄教授对福建农村的研究，可作为分析这种改革力量的过程和成因的重要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尝试改变农民心态，并以土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促使国家现代化。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改弦易辙，以强调家庭耕作的生产责任制（Responsible System）来取代过去失败的政策。本书道出原先被视为造成中国落后根源的企业心态、“中产阶级”思想和农民的价值观等，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答案。

农民、经济的进步发展、还有中国农村社会与市场和国家之间互动的特性和方式等，一直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传统的、革命前的中国的学者所关心的课题。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毛泽东去世之前，我们对现代中国所知甚少。外人难以获准进入。而我们的资讯来源，多倚重与现实有相当差距的政府汇报，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的人士的报告。但是这些人士，在意识形态上多早已认同中国共产党及看似必要的各种政策。有些较实事求是的“中国观察家”亦获准进入中国大陆。但由于他们的行程受限于某些特定地点，而他们主要的资料来源，又经过当局的筛选，所以大为削弱了他们观察和记录中国大陆现况的能力。研究人员即使获准从事调查工作，活动区域亦受限于工作地点，而且通常不得在任何农村一次停留数周以上。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允许外国研究者在大陆从事长期研究。所以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便随着广泛的田野调查而增加了。西方学者通常与中国学者合作，在单一地点作田野调查，时间多延续得相当长。若要

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像这样的研究条件是不能缺少的。

黄树民教授能够展开研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界的立场有了改变，使他得以客观地呈现一个农村多年来的演变。同时，黄教授本人的条件，对于他在大陆的研究也很有助益。他在大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并接受教育，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人类学训练；无论是汉语或是闽南语（或称福建话、厦门话）都讲得极为流利。这样的条件不但有助于他的田野调查，也使他得以深入探究分析农村的发展。

在本书中，黄教授详述了该村村中最重要的干部的生活历程，但行文时亦融入广泛的记述人类学的研究心得，以及和村里村外的人士的访谈记录。他以记述人类学和生活历程双管齐下的方式，呈现并分析受访者的个人看法，诠释他们在经历中国革命不同阶段时，个人社会生活的改变。黄教授亦深入剖析了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所遭遇到的整体问题。他透过与受访者之间的自由交谈，道出他个人的看法，让读者体验到田野工作者访谈的策略、恐惧、压力，和在访谈过程中寻求自我肯定的心情。借此机会，读者得以了解，为何在做出最终结论时，田野调查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黄教授已移往中国其他地区作田野工作——现在他在北方的山东从事研究——我们可以预见会有更多资料出现，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农民在中国大陆发展和改变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着重于地域性差异的中国比较研究。像黄教授所做的研究，正可构建必要的基本资料，以便了解中国社会的多面向的本质。本书针对中国单一省份的变化进行探讨，不但对于这类知识的累积有极大的贡献，而且也将成为未来比

较研究的经典之一。

1989年序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葛伯纳先生现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并曾担任该系系主任〔1972—1987〕，长期从事台湾农村研究工作）。

参考书目：

Hinton, William(1972).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Huang Shu-min(1981). *Agricultural Degradation: 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wan*.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二 版 序

黄树民

自1989年本书第一版面世，我从大学生、学界同仁、朋友和普通读者那里得到热情、肯定的反响。这本书在一些大学里被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通过阅读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活史，看到一幅关于一个人、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成长、动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把这些纷繁的事件交织在叶文德的生活中加以讲述，有学生从普通大学课本中通常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

普通读者的反映更加不一。有位女士的祖先一百多年前从厦门地区来美，她请我帮助寻根（我建议她和提供这种服务的厦门市政府侨办联系）。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工程师写信向我致谢，说我帮他解开了他在中国遇到的许多难解之谜。另一位读者感谢我，她因叶书记那样的基层政府官员的模范工作而对人性保持希望。东海岸的一群社会活动家问我是否愿意率团赴华旅游，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关于中国农村潜在问题的直接知识。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我在山东的研究，也使我能在1987和1991年间常回中国。虽然，我集中研究山东的迅猛发展，但也时常会思考林村可能发生的变化。我偶尔给叶书记写信，大约一年一次。他很少回信，也许是因为他时间紧，也不会用英文写信封。我真

的设法在1985年离开林村后去看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1990年，当时我办事路过厦门。还有点时间，就打出租车去林村。我在叶书记家和他吃午饭，再没有其他时间。随后，我于1991年夏天路过厦门，在市里和他待了一个小时。我的印象是，林村的情况不错，叶书记像往常一样，对未来表示乐观。

尽管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西方多数持非党派观点的报道表明，经济的持续发展恰可谓正在出现的另一个东亚“奇迹”，中国大陆将很快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火车头。1988年以后，台湾当局放松了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限制，这使华南，尤其是近在咫尺、共享闽南话的福建，成为台湾劳动密集型“夕阳工业”的出路所在。台湾的资本、整个工厂和管理人员的流入，把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变成了吸引人的发展区。

最近的发展势头让林村在何种程度上受益？村民们是否顽强地依附在自己的农田上，以农事勉强维生？或许他们抓住台资带来的机遇，积极转向工业生产？村民们如何应对从台湾海峡对岸带来的移植文化？1991年我结束了在山东的研究计划，开始考虑重返林村的可能性，来看它在如何变化。

我的重返计划终于落实下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过去为CSCPRC，它曾支持我前次的林村研究）于1995年通过了我的项目资金申请，在林村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不过，由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决定是在3月做出的，除了下一年，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旅行。1996年初，我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协助下向中国政府申请研究许可，但两次都被拒绝。我的直觉告诉我，是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毁了我的行程，因为林村位于厦门岛的东侧，正对着国民党

占领的金门群岛（那年夏天大陆向台湾附近海域试射了导弹）。

1996年8月，台湾和中国大陆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我又产生了重返林村的愿望。在我过去的学生范可的帮助下——他为完成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正在闽南做田野调查，在给地方有关部门写了许多信之后，隶属于厦门市政协的社会发展研究所终于向我发出了为期一个月的邀请。此时夏季将过，要考虑一个长假已经为时过晚。我改变计划，把研究放在1996年冬季，因为我的资助金属于1996年财政年度。我迅速去信通知叶书记，告诉他我想在1996年冬天成行，请他帮我找当月的住房。他让我放心，说可保证万无一失。

在那个月，我得以和许多村民重温旧谊。确实，多数村民欢迎我，就像在海外待了12年后回来的亲戚。许多人家设宴款待我。村民们急迫地让我看他们新盖的房子和新买的高档商品，例如卡拉OK音响、汽车、大屏幕电视等等。我在叶书记的帮助下，抄了村里从1992至1996年的底账。这些账目是关于这个村子人口构成及生产力变化的清晰写照。由于村办企业的激增，我得以造访五位厂主，询问关于运营、资金和材料来源、招工和市场网络的情况。我还陪着叶书记跑大投资，和政府当局、贸易代表以及其他商业代理打交道。关于那个月的观察和资料，我在本书的修改版里增加了两章内容。第11章从总体上描述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林村。我在这里分析引起变化的动因，分析因而发生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村内社会分层的增加。

第12章我把焦点放在叶书记和他在村里遇到的问题。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年轻的村长侯桐之1994年死于肝癌，彻底改变了叶。尽管叶仍然是个独裁人物，大多数村民也怕他，但

他变得越来越与大家疏远和漠然。经济繁荣也在村里引发了新的权力之争，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或近亲纽带彼此争雄。叶书记面对这些新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地待在村外——躲进新建的娱乐设施中，例如餐馆和卡拉OK厅。我看到叶在这些卡拉OK餐馆中消磨大量的时间，唱过时的革命老歌，借以逃避现实。他与歌厅小姐们的交往，显示出一个时代、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干部和把集体利益置于私利和私欲之上的那种思想的消逝。

我们可以从林村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新阶段。但是，这种变化的机制却与既定的西方经验相左，这些西方经验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模型中常常被定义为现代化过程。在中国，做买卖和风险投资的时候，建立在家庭、亲属、邻里、语言以及同事或同学的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原生纽带仍然起作用。同时，尽管国家和政府由于实行权力下放政策而弱化，失去了许多控制普通公民生活的无限权力，但一直在竭尽全力建造一个规范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以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转。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无序的繁荣发展中看到了村民们的创造性智慧，他们能够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开拓一个较好的生活空间。我希望用这些新增篇章来捕捉林村出现的充满跃动的变化。

感 谢

黄树民

本书是我数年来在中国东南福建省南部所作研究的总结。我的经费来自几个不同组织，美国学术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赞助我在1981年时到厦门市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暑期研究计划赞助我在1981年时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一个月的图书馆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提供的奖助金（Fellowship）使我得以在1984至1985年间到福建展开田野调查计划，我非常感谢上述机构对我的研究的支持。

1985年秋天，爱荷华州立大学给我一个学期的教员研习假，使我得以开始撰写本书。促成这次假期的是当时担任学术研究的副校长克利斯坦生博士（Dr.Christensen），及社会及人类学系系主任克隆兰博士（Dr.Klonglan）。1985至1986年间，有两位研究助理协助我进行研究工作。一位研究助理的经费来自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粮食研究所〔当时担任所长的是罗德鲁克博士（Dr.Roderuck）〕，另一位的经费则来自科技及社会改革计划（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rogram）〔现在由华仁博士（Dr.Warren）带领，但当时是由琼斯博士（Dr.Jones）带领〕。我深深感谢

他们慷慨提供财务支援，并对我保持信心。罗德鲁克博士还提供经费以供草稿的编辑工作之用。

我的研究生涯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教导、友谊及鼓励，我才能从研究中国农村的过程中，发展出对人类学的喜好。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教授，及日本笛波大学比较文化系主任王嵩兴教授，首先引导我从事台湾汉人农村的田野调查。他们执著所学、坚持立场的道德理念，不受政治压力左右，深深地影响我的学术生涯。在我就读研究所的那几年，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葛伯纳、葛瑞黛教授夫妇不但视我如家人，并且一直给我导引、鼓励及知识上的交流。我和他们亲密合作多年，所以才能以新的角度来面对不同的主题。

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前任所长陈碧笙教授使我得以在福建展开研究。他也指派4名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帮助研究的进行：台湾研究所的葛小佳和苏为民，以及人类学计划的石裕龙和郭志超。如果少了陈教授的持续支持和适时的建议，这个计划便无法完成。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和林村的村民尽其所能让我感到宾至如归，笔墨实不足以形容我心中对他们最真诚的感谢。

有几位师友曾看过本书的初稿并提供宝贵意见。葛伯纳教授首先提议本书采用目前的结构，并在看完全部草稿后，对如何修订提出了重要意见。爱荷华州安梅市的嘉德纳女士（Kathy Gardner），以专业的能力，协助完成定稿的编辑工作，并在内文中加入重要的附录。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怀弗德（Whiteford）和德兰（Derman）教授，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的副总裁柏根肯普（Dean BirkenKemp）也和我商讨书中必要的修订之处，以使本书获得广大读者的接纳，非仅流传于少数中国通之间。

最后，我要谢谢内子陈光蓓，还有我的孩子黄明心和黄明
免。因为他们愿意让我在外长期居留，并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
才能完成田野调查的工作。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古老的大河文明之一。从最早开始农耕的北方，数千年来，勤劳而聪慧的农民，开垦了黄河流域无数丰饶的河谷和冲积平原，发展出稳定的农耕社会，并扩张到亚洲大陆东部滨海的每一个角落。（Anderson 1988）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

在传统中国里，农民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的地位，最多只能说差强人意。一方面，传统的儒家学者和官员认识到农民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角色，慨赞农民之伟大，并捧至仅次于士绅阶级的半贵族地位。在理想化的儒家世界中，这些贫困卑微的劳苦农民和士绅阶级一样受到尊敬，因为他们重视传统、和谐，而且对政府忠诚。儒家学者最早就是从踏实的乡民习得人类社会的知识，由此滋长为在政治上为公众服务的企望。

但是，这种正统的思想，只存在理论上而非现实中，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它。农民从未享有儒家学者尊奉他们的崇尚地位。而且现实差不多与理想相反。战国时的孟子在与当代的小国君主和贵族对话时，谈到农民饱受虐政之苦：

凶年饥岁，子之民，老弱转于沟壑，
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公孙丑下》

译文：在凶荒饥谨的年岁，您统治的人民，老弱和体弱的都不免一死，尸身被搬去填在田沟山涧里，年轻力壮逃到四方去的约有几千人。（台湾三民书局，《新译四书读本》）

除了居住城镇中的商人、地主和高利贷债主会祈望农民愚昧无知或发生不测、以壮一己之私外，连士绅阶级本身也常巧取豪夺农民手中仅余的粮谷，使得农民失去抗搏天灾、外敌或任何突发危机的本钱。赛珍珠（Pearl Buck）敏感地对中国农民的无力感下结论：“他们是一群没有声音的人，虽然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受到地主的压榨，政府的课税。若能躲过饥荒和洪水之害，才能生存下来。”（Buck, 1949, p.vi）从孟子的时代到赛珍珠的时代两三千年之间，似乎没有多少改变。

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模棱两可。此外，他们还须面对亘古以来的大敌——自然界。他们必须克服贫瘠的耕地、困难重重的山坡、敌对的游牧民族、甚至是海洋，才能取得有限的耕地。同时，农村家庭的人口不停地增长。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生产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这正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人口论》一书中，悲观预测的人类惨剧的典型。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中，更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此，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将之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显著的特征（e.g.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 1944；Elvin 1973；Perkins 1969）。此特征是，在朝代初兴时会有一段稳定繁荣期，接着慢慢产生分裂，导致骚乱及战争，最后旧的政权被推翻，由新的政权取代。在末期的动乱中，有相当的人口会死于战争、饥荒、迁徙和瘟疫，

直到人口和土地重新达到平衡，新的轮回于焉开始。

偶尔，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会有重大的革新和突破，使得农业生产的极限往上升高，于是延缓了人和自然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这种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像是铁犁或间作（inter-cropping）都属于这类。16世纪时中国引进美洲发现的农品种，明显地助长了后来数百年间人口的增加。同样地，17和18世纪间，农民人口扩张到中国西南，19世纪时向满洲移民，也减少了潜在毁灭性因素之威胁，人地之争才不至于在20世纪前升到临界点。

传统上，农民吃尽苦头。但他们的生命却显得有意义而且易于满足，社会也就有弹性得以复原。在经历主要的朝代更替之后，农民很快地回到农村，默默建造简陋的房舍，辛劳刻苦地耕种。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劳苦和聪慧早被人遗忘，依然居于社会最底层。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们如此稳定，默默忍受这一切？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农民不断遭受暴虐帝王和刻薄士绅之害？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可能的因素。

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中，最能使他们保持稳定的因素是对“家”的顾念。在传统农民世界中，家不仅是提供食物、舒适、保护及老年照顾等徒具物质和经济意义的房舍而已。更重要的是，家更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和仪式上的意义。透过家这个实体，农民才能求得时空的连续性，并为自己死后的灵魂觅得栖身之所。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家不仅为现存的成员而存在，在现世的观念之中，家是已逝的祖先和未出世的子孙汇集的地方。所以男性在尘世上的定位，端视他联系过去和未来的能力而定。对他的祖先，要妥为安葬并定时以牲礼祭拜；对于子孙，要让他们有屋可住，娶得娇妻，生个儿子。